

第一章

cong suo guo zi bi dao men hu dong kai

从锁国自闭到门户洞开

第一节 先驱传教士们的无奈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始于 1807 年（嘉庆十二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R. Morrison）。

马礼逊其人

马礼逊 1782 年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农村家庭，后来因为家贫，父亲去纽斯卡尔谋生，随之举家迁往。马礼逊跟其父亲学做鞋楦头的手艺，从小经常少衣缺食，但他读书勤奋，学习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成绩尤佳，21 岁时入霍克斯顿神学院，旋转入高斯坡神学院学习，这是一所培养传教士的专门学校，除了设宗教课程外，还教授天文、医学的基础知识，一些去非洲和印度等地的传教士也常去该校介绍经验。1804 年，马

礼逊加入伦敦传教会决定来中国传教后，又向一位在伦敦的广东人杨善达学习中文。此人后来与马礼逊同来中国，马礼逊为他在广东一家洋行谋得一优裕职位。马礼逊还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抄录了一本由天主教教士巴设译的且并不完整的新约圣经，它后来成为马礼逊翻译圣经的蓝本。

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不久即受派来中国。他本向东印度公司订购直往中国的船票，东印度公司因为不愿触犯清政府禁令，予以拒绝。马礼逊只得先往美国，在那里搭乘“三叉戟号”商船经过4个月的航程，于1807年9月4日首批抵澳门，三日后再达广州。因为他携有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给广州美国商馆的介绍信，所以受到在广州的美国人的接待，被安置在商馆里，供有膳食。然而马礼逊仍不得不对广州当局隐瞒其传教士身份，在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斯当东男爵的帮助下，一面延师继续学习中文，一面翻译圣经和编撰《汉英字典》。18个月后，即1809年2月，东印度公司正式聘他为公司译员、年俸500英镑后又加到1000英镑。自此以后，马礼逊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身份，可以合法在广州定居。

在东印度公司出资聘来的两名华籍教师协助下，马礼逊经过7年艰苦工作译成了新约圣经。1815年起他又陆续出版了自己编撰的《汉英-英汉字典》。此外，马礼逊还用英文撰写了《汉语语法入门》和《广东土话词汇》等书。这些语言工具书不仅是为翻译圣经而作的必要准备，还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起到有益的作用。

由于深入中国内陆传教十分困难，1813年马礼逊乃向伦敦传教会建议，以印度以东地域为传教范围，组成恒河外传教会，还提出“恒河外传教会计划”内容包括办学校、出刊物、联合其他差会传教士共同布道等。那时马礼逊一部分时间在广州，应付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业务，一部分时间从事翻译圣经和传教工作。当伦敦传教会派出的另一传教士米慎 W. Milne 到达澳门以后，他们就

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开展传教活动。选址马六甲是因为那里离中国不远，往来船只多，居留的中国人也不少，特别是当地官府欢迎传教士。米怜在那里负责办学及出版事业，马礼逊则主要在澳门及南洋的华人中间传教。当然，他们在广州家里还是暗中进行布道。

1814年马礼逊秘密吸收了第一个基督教信徒蔡高，他们趁重阳佳节人多外出登高之际，在澳门海滨的一处山泉中举行洗礼。蔡高是东印度公司印刷厂的雕版工人，在为马礼逊雕版印刷福音书中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不久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先后入教。另有一个雕版工人梁发，虽然表示要信教的时间还先于蔡高，但马礼逊觉得梁发羞怯于人前承认其信仰，所以又考验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816年11月3日才在马六甲由米怜为他施行洗礼。但是，既因为蔡高早逝，又因为梁发信教后确实奋力布道、撰写宗教单张等，深得传教士欢心。因此，1823年马礼逊选择梁发在自己回英国期间，负责广州、澳门的传教工作。于是特为梁发行了按手圣礼，这样梁发遂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传教士。

梁发在8岁时曾入过私塾，因此初通文字。1819年他返回家乡广东高明县，热心传教，在家中写了《救世录撮要略解》等传教小册子。被正式按立为宣教士后，继续撰写了《真道问答浅解》、《圣经希伯来书注释》、《圣经日课初学使用》等10余种布道用书，还亲自雕版印刷，亲往内地散发。他利用科举考试的机会，向应考的员生分发。后来洪秀全在广州考场中获得的《劝世良言》，也是梁发的著作。鸦片战争前夕，梁发来到广州，专在传教士开办的西医馆中布道，直到1855年去世。

作为“恒河外传教计划”，在马礼逊的倡导和参与下，1818年在马六甲兴建了英华书院。校址的土地是英国殖民地当局所圈赠，奠基仪式由当时马六甲的英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主持。米怜为校长，他们办学的目的是为便利东来的欧洲人学习中文，同时也

向当地华人子弟教英文，实际上是所双向的语言学校。伦敦会传教士在南洋地区还创办了几份中文期刊。

马礼逊身为东印度公司的译员，自然为从事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效力。他也很早就开始投身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1816年英国政府派遣国会议员阿美士德爵士为特使，赴北京商谈两国通商问题，马礼逊被任命为这个使团的中文翻译（中国称汉文正使），随同北上。清帝嘉庆也很重视，着钦差以礼接待。但是在商谈觐见的礼节时，中方坚持要英方用跪叩大礼并且称英方的国书为禀帖。英方坚决不从，以致谈判未开。虽然历时几近一年的交涉归于徒劳，但马礼逊等仍趁北上的机会，了解中国内地的情况，也算完成了英国外交大臣所指示的部分要求。这些经历也加增了马礼逊的身价。1817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马礼逊神学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学会也吸收他为会员。1824年他回国休假时，伦敦传教会特选他为全国委员，东印度公司总部特设礼接待，英王乔治四世也传旨嘉奖，称他的工作是“卓越的和有用的”。马礼逊利用回国机会，去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等地访问，到处演讲大受欢迎。

1826年马礼逊再度来华后被提升为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1834年英国政府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特权，另行委派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任后即任命马礼逊为可以穿着副领事制服的秘书兼翻译，年俸为1500镑。马礼逊当天写信给亲友说：“我本认为来中国是穿传道服装的，不意如今却得以穿副领事的礼服了”。^①信中掩饰不住一股得意之情。马礼逊任律劳卑助手的时间不长，仅一个月后忽然患疾病去世，终年52岁，墓葬澳门。他的两个儿子马儒翰（J. R. Morrison）、马理生（M. C. Morrison），后来也定居中国。一个参与中英《南京条约》

^①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6页。

的谈判，后来任香港殖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另一个担任过英国驻广州的领事。

马礼逊为传教生前写了不少布道小册子，特别是 1813 年译出《圣经·新约》，1819 年在米怜的协助下译完了《圣经·旧约》。马礼逊将他译的圣经定名为《神天圣书》。

公理会的“排头兵”

公理会兴起于 16 世纪末的英格兰，由当时的清教徒组成，现主要盛行于美国和英国。近年来在其他地区多已同其他教会联合。其特点是会众坚持民主、平等，不听命于任何上级机构，同一宗派的教会可按城市或地区组成协会或联合会，美国有一些著名大学与公理会关系密切。19 世纪初，经广州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的鼓励和资助，美国公理会（在华又称美部会）遂关注来华传教。经过物色培训，1829 年 10 月裨治文（E. C. Bridgman）和雅裨理（D. Abeel）二人首途来华。

裨治文 1801 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 年在阿姆斯特学院毕业后即进入安多弗神学院，1829 年神学院毕业即被按立为牧师。来华前他从差会得到的任务主要是学习中文，以便编译布道书刊，尤其是为翻译圣经，似乎要他着重于借助文化活动传教。1830 年 2 月他免费乘坐奥立芬的商船抵达广州，那时同孚洋行已经为他提供免费的住房和一名仆役，他就在马礼逊和梁发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

同马礼逊抵中国时的 1807 年相比，欧美资本主义毕竟又发展了 20 多年。如今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福布斯号”，已经往来于广州和澳门的航线上。在华的欧美官员、商人人数也有很大增长，马礼逊、裨治文等便在当地英美基督徒中发起成立“广州基督徒联合会”着手设立资料库与图书馆，并且在马礼逊倡议下，裨治文办起了一份英文刊物，名《中国丛报》（又译为《中国文库》）、《澳

门月报》等），专向西方人士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和其他人文情况。奥立芬除了提供印刷条件外，还愿意承担“出版中出现的亏损”。

裨治文还在当地英美人联合发起的一些其他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1834年11月，广州外侨组成实用知识在华传布会（又称中国益智会），目的在于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中国人。该会重印了当时已经译出的《伊索寓言》。裨治文又译出了《美利坚合省国志略》等史地书。后来魏源撰《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寰志略》都参考过这本书。在华实用知识传布会成立时英商马地臣为会长，美商奥立芬为司库，裨治文是三名秘书之一。马礼逊去世后，广州外侨为纪念马礼逊的事业，于1836年9月特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其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教中国青少年读中文和英文，并通过媒介将西方各种知识传递给他们”。^①当时英国鸦片商颠地为马礼逊教育会会长，裨治文为通信秘书。裨治文为执行会务，向英国和美国有关方面呼吁派遣教师来中国办学，经费由马礼逊教育会承担。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师生热情响应，他们推荐了校友勃朗（S. R. Brown）来华。1839年勃朗夫妇到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1848年勃朗返美时特地携带容闳、黄胜、黄宽等三名学生赴美深造，他们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著名的政治改良家、教会文字工作者和第一代中国西医师。马礼逊教育会于1848年第十届年会后就逐渐停止活动，它所资助的马礼逊学堂也于1849年解散。当1838年公理会医生传教士伯驾（P. Parker）邀约其他西籍医生组成中华医药传教会时，裨治文又担任该传教会的副主席。所以裨治文除了传教外，还参与了出版、教育和医药三方面的活动。这也反映了早期传教事业的开展同这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裨治文社会交际广泛，所以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特邀裨治文

^① 《中国丛报》第4卷，第90页。

去虎门观看销毁烟土的情景。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 美国政府觊觎这种侵略利益 急忙随后跟进。1843 年派遣顾盛为特使，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其内容比《南京条约》的侵略性还有所扩大，增加了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兵可以到中国沿海港口“巡查贸易”等条款。顾盛受命后，一到香港立即聘裨治文为使团秘书之一，还兼任使团的牧师。条约签订后，顾盛给美国国会牧师的信中写道，“这次和中国的谈判，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所提供的服务，若非不可缺少也该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了解，使他们成为难以衡量其价值的顾问”^① 这些话充分反映了这些传教士在殖民侵略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加快了汉译圣经的步伐，将战前已有的重印圣经委员会扩大成员，裨治文原来即是该委员会的一员，1847年该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裨治文从此迁居上海。1856年上海外侨组织了一个名为上海文理学会的学术性团体，裨治文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无疑地这又提高了裨治文的名声。两年后这个学会隶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名称也改为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它在上海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尤其图书馆的藏书量闻名远东。1859年裨治文主动辞去会长职务，两年后裨治文患痢疾不治，当年11月在沪去世。后来美国妇女联合布道会和裨治文夫人为纪念他，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塾。该校1881年迁上海，即为有名的裨文女中。

与裨治文同船抵达广州的另一名传教士雅裨理，开始是受美国海员之友会指派，专在来华的水手中传教。一年后他归属公理会，奉派先在南洋一带活动并学习闽南方言。此时他写出《中国及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4页。

其邻国旅行记 1830-1834)》后来因病回国 在美国为传教事业宣传鼓吹。1839年雅裨理再来中国时正值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前夕 时局十分紧张 雅裨理留在澳门 直到英国军队侵占厦门后 他才于 1842 年到厦门公开活动。他在厦门居留期间曾去沿海一带考察，还乘兵船去过台湾。

雅裨理在厦门一带传教 3 年多，1846 年再次因病回国 当年 9 月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归国途中。在他短暂的来华生涯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与福建布政使徐继畲的交往。1844 年当徐继畲与英国领事会见时，雅裨理充当译员。他发现徐继畲对国外史地情况很有兴趣，遂趁此机会送给徐继畲一包地图册籍等，当然内中也包括圣经及传教书。此后徐继畲还单独与雅裨理见面，向雅裨理提出有关西方的各种问题。徐继畲是位勤奋好学的开明官员，他后来多次向英国历任使领官员请教、索书。1848 年，他刊刻的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书《瀛寰志略》就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

继裨治文和雅裨理之后，1833 年公理会差会派遣卫三畏 (S. W. Williams) 和崔时璵 (I. Tracey) 两名传教士来中国。卫三畏也是位著名传教士，主要主持公理会的出版工作。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近 80 篇论著 编出《广东方言发音字典》、《中文音节字典》和《中国总论》等，《中国总论》系两大卷汉字注音字典 有 1.2 万多单字 耗时 11 年 它与《中文音节字典》一起都被当时的外国人视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卫三畏曾去日本、琉球等地活动 5 年 还用日文翻译了《圣经·创世记》等。1844 年他返美结婚和度假，同时接受博士学位。1856 年至 1876 年第二次在华的 20 年间，卫三畏辞去了传教士之职，专任美国政府的外交官员。起初是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1858 年他随美公使列卫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以后又曾 7 次代理使馆馆务。1877 年退休返美后被耶鲁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又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当初的传教士之职，成了他进身之阶。

在卫三畏首途来华的第二年，差会又派了医生传教士伯驾来广州。他在中国不仅事迹较多，而且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涉及面也较广，将在第二节加以叙述。

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内，美国公理会共派出 6 名传教士到达中国广东，他们都未能深入内地。

心计不凡的郭士立

在清朝政府严厉的禁教令限制下，如果说马礼逊等人的传教活动还比较稳健的话，那么郭士立（K. F. A. Gutzlaff）来华传教就显得急于求成了。他竟不择手段，利用走私鸦片机会，窥探我国国情，甚至鼓吹并参与侵略战争等，十足像个殖民主义冒险家。

郭士立 1803 年出生于普鲁士东部小镇普立兹，自小学铜匠手艺。但一直向往到国外游历，为此学了不少航海知识和技能。曾受普鲁士国王青睐，准备派他在驻土耳其的使馆工作，要他学习土耳其文及阿拉伯文。但他最终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18 岁时考入柏林耶尼克传教士学院，不久转入荷兰鹿特丹神学院。1826 年毕业后即被按立为归正会牧师，并被荷兰传教会派往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爪哇。郭士立为此曾去英国和法国收集东方资料。在伦敦拜访马礼逊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27 年他到达爪哇，经伦敦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介绍，向华人分发传教小册子，每天跟当地的华侨学习闽、粤方言，在医院中布道时还学了一些医药知识。1828 年郭士立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活动和学习中文。1829 年他前往马六甲，接受伦敦会的津贴，协助伦敦会工作。因荷兰传教会不同意他来中国，他乃脱离差会关系而自由活动，终于来到广州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译员。

郭士立第一次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是 1831 年。他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为自己的姓氏，一身中国水手打扮，带了海图、测绘仪器和传福音的书刊等，6 月 3 日登上贩运鸦片的“顺利

号”货船，混迹中国船民间，通过与水手们聊天，了解中国沿海情况。他一路沿海岸北上，历经厦门、台湾、宁波、上海，直至天津。本拟进北京城，但苦于既不谙北方话又无熟人，只得作罢。回澳门后，他更决心“为了打开与中国自由交往的局面而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措施”。1832年2月，他乘坐由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统领的“阿美士德号”侦察船，第二次沿原路线北上。这次还到了朝鲜和日本，在中国海岸还深入长江以内的吴淞、宝山等地。回来后，他写道，“这一切我已调查清楚，希望商人和传教士重视这些有利可图的地方”。他记载：长江口有几条装着火枪的战船，镇上的士兵携长矛马刀，大部分军官都没有受过教育，工资低，许多将官都是满族人，享有很高的工资待遇，长江左侧的要塞建筑成群，守军对炮台作了精心部署，但是并没有防御之术，仅依赖墙固壁厚，弹药性能也差，所以强攻还是可以攻破的。郭士立甚至煽动说：“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出现，对方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①他对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也作了描述，他得知上海主要出口丝绸、豆饼等江南传统产品，他看到长江中千帆穿梭，认为上海是“中亚门户”。第三次北上是在1832年10月，他乘坐大鸦片商查顿直接提供的走私快船“赛尔富号”径直驶东北的奉天。直到第二年4月底才返澳门。后来郭士立出版了一本《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实际上他的沿海侦察活动有十次之多。

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以后，郭士立直接参加了这场战争，为英国侵略军效力。在传教活动方面，郭士立也翻译了一些分卷圣经和布道小册子，还写了一些介绍东西方文化的书册，如《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尤其以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杂志为最有名。该刊物从1833年发刊到1837年停刊，广泛介绍了中西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郭士立、麦都思和马儒翰

^① 郭士立：《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英文版），第154页。

联合翻译的《新约圣经》在 1840 年出版时定名为《新遗诏书》也就是后来流行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圣经。（833 年 11 月居穗外国侨民发起的）实用知识在华传布会成立后，郭士立被聘为该会三名秘书之一。郭士立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和《英国史》也归该会出版了。鸦片战争结束后，郭士立认为在中国大肆开展传教活动的时机已到，1844 年便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名为汉会（又称福汉会）的组织。他不赞成设立固定教堂而主张游历布道，所以雇佣了数十名华人为会员，派他们进入内地分发福音书及宗教小册子等。1849 年郭士立去欧洲为此事募捐。汉会会员逐年增加，散发面也不断扩大，最多时达千余人。但是两年后，他 48 岁时因病去世于香港。

美国浸礼宗的先遣传教士

浸礼宗的特点是坚持信徒在受洗礼时必须全身浸入水中。全身入水的浸礼渊源要追溯到 16 世纪英国教会中的再洗礼派。它传至美国后又分化出浸礼会（多在南方）浸礼会（多在北方）和安息日浸会等许多支系。鸦片战争之前浸礼会也试图来中国传教。1833 年，该会派出钟约翰（J. T. Jones）经由缅甸到达暹罗，在曼谷曾为 3 名华侨施浸进教，但他始终没有到过中国。1834 年浸礼会又派出遴为仁（W. Dean）经新加坡抵达曼谷，在那里开办了第一个华人浸会教会。后来又往来于澳门、香港间。1837 年他在澳门创办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会，他也是早期的圣经翻译委员之一，与裨治文一同推敲确定“浸礼”一词的译名。1842 年起遴为仁先后到过宁波、上海进行考察，最后决定在广东潮州传教，建立了 5 个教会，为几百人施浸。他还编过一本潮汕方言的《英汉字典》。但这些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活动。

被基督教内称为中国浸信会鼻祖的传教士叔末士（J. L. Shuck）也于此时来华，他出身贫苦，靠自学成长。1835 年受牧师

圣职后东来，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往来于广州、香港间挨门逐户地布道。香港被割据后，他定居香港，出任英人主办的《中国之友》报的编辑。1854年返美后，便没有再来中国，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中传教。罗孝全（I. J. Roberts）是浸礼会一名热心来华的传教士。来华前他已在美国任牧师。看到郭士立有关中国的介绍，他捐出3万元成立罗孝全基金中国传教会，自己也于1837年5月来到澳门，在麻疯病人中传教。鸦片战争结束后，他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从而结识了洪秀全。

英美圣公会差会的尖兵

圣公会在英格兰是国教，自然地位不一般。美国独立后，脱离英国而独立组成的美国圣公会实力也很强，也较早组成差会，在海外布道活动中跃跃欲试。早在1821年美国圣公会先参加英国圣公会派赴非洲和印度的传教工作，从中积累经验。1834年5月差会明确作出决议以中国为布道区。隔了一年派出骆克武（H. Lookwood）和韩森（F. R. Hanson）两人乘坐“马礼逊号”帆船越洋而来。虽然已抵广州，仍是因为无法深入内地只能折返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不久两人都离职他去。1835年另有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信徒文惠廉（W. J. Boone）主动申请去中国传教。经过一年神学训练又学了一些医药常识，第二年被按立为牧师后即直接到达巴达维亚。1840年迁居澳门传教，同时在马礼逊教育会办的学校教书。鸦片战争结束后，文惠廉持首任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的名帖，至厦门鼓浪屿，依仗英国军队的势力霸占了多所民宅，设立传教站。《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又鼓吹利用五口开放通商之机扩大传教活动。差会觉得文惠廉很有魄力，1843年让他立即回国，授以神学博士学位和主教圣职。第二年文惠廉又匆忙带了6、7名教会人员经香港直抵上海。从文惠廉个人升迁之快来势之盛，可以反映出美国圣公会如何急于争夺中国这个布道区的，上海

后来也果然是他们大显气势的根据地。

英国圣公会的差会在中国习称行教会，于 1795 年成立。它凭着英帝国的殖民气焰，早就对向中国传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01 年拨出专款将珍藏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早期汉译圣经手稿付印作介绍，后来又多次请伦敦传教会和马礼逊向英国信徒作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等。也许因为有了阿美士德爵士使团来华失败的教训，差会迟迟没有实质性动作。1837 年中英战云紧迫，他们聘请已经在印度的随军牧师史奎尔（E. B. Squire）亲赴新加坡、澳门等地进行“侦察旅行”。然而还未及史奎尔作出“侦察”汇报，鸦片战争已经打响了。所以，英国圣公会差会反而在战争前没有一名正式的传教士来中国。

美国长老宗的尝试

长老宗在基督教内也是一个大宗派，在有些国家称为归正宗。其特点是教制上采用古代教会通用的长老制，教会不设主教，由每个教堂信徒选出若干名长老负责教会，包括延聘牧师等也以长老们的决定为准，类同于政府机构，每级教会组织又归上级议会指导。美国长老会在 19 世纪初已分成南北两派，北长老会在 1812 年就与公理会等其他差会接洽过来华传教问题，只是因为双方准备不足而未果。过了 25 年，美国北长老会总议会在决议中强调，“长老会教会本是一个传教的教会，其目的是要全世界皈依基督”，^①由此可见其海外宣教的雄心。1837 年美国北长老会曾派遣厄珥（R. W. Orr）和米切尔（A. Metcchell）两对夫妇东来，也是滞止于新加坡。一年多以后，一对他去，一对病故他乡，毫无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若无鸦片战争这场罪恶的军事侵略，基

季理斐：《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英文版），第 379 页。

基督教传入中国还得延迟一段时间，也会呈现另一种传教过程。换句话说 基督教是藉着 19 世纪中叶殖民主义侵略势力传入中国的。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轰开的大门

外国殖民主义政府在 1840 年与 1860 年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政府的屈辱失败而结束。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是践踏中国主权的 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奇耻大辱和深重灾难，但是给传教事业却带来了明显的直接利益。因此，几乎每个传教士都对这种恃强凌弱的西方殖民主义行径表示赞成和支持。

早在 1821 年 10 月中旬 英国兵船的一批水手 在珠江口外的伶仃岛上与居民发生冲突、殴斗，当地人打伤了两名水手。英军闻讯后派来一队武装士兵上岛报复，动用火炮轰击，以至中国村民两死一伤。中国官员在交涉中要求英方交出肇事的两名水兵。可是英方蛮横抵制，竟谎称凶手落水身亡，企图逃避罪责。一时间事态扩大到双方断绝贸易和交通。马礼逊此时献计，由英国政府“调查闹事者，加以严办”，冲突遂告解决。像这样一种中国法律管不了中国领土上的外国罪犯之事，实是日后领事裁判权的滥觞，然而它竟出自一名传教士的计谋。后来，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作为英方翻译 积极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 起草直至成文签约。英方的签约代表璞鼎查在出任香港政府第一任港督后，马儒翰立即被任命为香港政府的翻译官。父子同辙，决不是偶然。

那个脱离差会管辖、行止无羁的郭士立，更是公然为侵略活动服务。30 年代初期，已经几次三番对我国沿海进行考察，成为身

有专长的中国通。鸦片战争一打响，他就全身投入这场罪恶战争。他起先担任英侵略军司令官郭富的翻译和向导。1842年春，当英军攻占宁波和舟山以后，他接受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以便有时以传教士面貌安抚百姓，有时以官长身份向百姓强征粮草。当英军入侵上海不久，他也随之而至，代表英军颁发安民告示，向上海知县勒索总数达30万银两的赎城费。同年6月，侵略军进攻镇江，因当地军民奋力抵抗，久攻不取，郭士立就亲自参加围城。城破后镇江军民遭到残酷屠城。中英议和时期，郭士立和马儒翰一同参与起草并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二年他又担任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签订时的译员。正因为郭士立为英国侵略中国立下汗马功劳，香港殖民政府在它未去世之前就以它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香港马路——吉士笠街。

19世纪30年代来中国的裨治文、伯驾等美国传教士，也是美国殖民主义利益的急先锋。他们发表了许多言论，鼓吹使用武力和煽动侵略战争。1834年底中英交恶时，在广州的全体英国商人向英王上书，狂妄要求英国政府派遣军队来中国逞威，要挟清政府开放宁波和厦门。那时裨治文连续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支持英侨呈书英王。他说：“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它（指中国）那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使各国的权利和它的义务相一致的道路上来，”^①将中国大门对侵略者敞开说成是中国的义务和外国的权利！裨治文又说：“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能同它以礼相待。”^②过了1年，中英对峙更紧，《中国丛报》登载一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迫切的重大要求》，文中明确主张以武力强迫中国签约。裨治文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用挑衅的口吻说，最近的沿海侦察证明，中国是个土地辽阔而又孱弱的国家，

① 《中国丛报》1834年12月第363页。

② 《中国丛报》1835年1月第406页。

只需一个团的英国兵就可以打败中国几个省的军队。所以应该用大炮作为谈判的后盾。最后，裨治文声称，“我们是主张采用强硬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① 1836年11月，《中国丛报》还刊载了《备忘录》。《备忘录》实际上是一外国社团递呈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对华政策建议书。后来事实证明，《备忘录》所列各点乃是中英不平等条约内容的胚胎。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上编撰了大事记，专门介绍战争交火情况和政治交涉过程。文中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② 《中国丛报》暴露了它的真实身份，它既是西方了解中国的耳目，又是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喉舌。与裨治文同时来华的雅裨理，此时也叫嚷发动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③ 它讲了一连串的“必须”，“必须派传教士进入中国每一个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必须侵入海港、海岸”，“必须开出一条路来”，“必须占领可以据守的阵地”，^④ 简直像下作战命令。另一个在1854年来华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 L. Nevins）虽然无缘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也明确表态说，“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用来开辟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新纪元的”。^⑤

作为第一个来华当传教医生的伯驾，它的活动圈子与作用自然不同与裨治文等人。伯驾1834年10月抵达广州后，经过一番周折，第二年在广州开办一家眼科诊所名新豆栏医局。西医的治病手段，尤其外科手术，确实效果轰动。伯驾分文不取施诊给药，从医局开业至鸦片战争前夕，前来求治者几达1万人次，大大赢得

① 《中国丛报》1836年2月第449页。

② 《中国丛报》1840年5月第2页。

③ 《中国丛报》1849年5月第270页。

④ 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65页。

⑤ 转引自同上书第175页。

当地老百姓的好感。禁烟大臣林则徐到任广州后，闻得伯驾名声，却又碍于朝廷命官身份，不便迁就。于是遣下属商请伯驾，如何既诊治他的旧疾又互不照面，伯驾非常重视此事，特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编号为 6565 的病历卡。此卡不止是治疗方案，还是他同林则徐接触的载录。它记载着林则徐曾请伯驾译述《各国律例》以及曾向伯驾垂询鸦片的危害作用等。显然林则徐的目的是通过和伯驾接触，增加他执行禁烟任务的能力。而伯驾则抓住机遇企图调停中英冲突。伯驾写了一纸长信给林则徐，认为时局紧张是双方在意图上的误解造成的，而英国的要求是公正的，若中国不允许的话，其后果将是流血。最后伯驾恫吓利诱兼施地写道，“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恐怕也想占领中国，但是我保证英国仅是希望按照所能缔结的‘光荣条约’上所规定的进行贸易。条约一旦签订，英国就不会允许英国船只运送鸦片，也不会准许其臣民贩卖鸦片，其结果乃是双方有利”。自然，伯驾所作的分析是不真实的，后来事实也证明，所谓“光荣条约”其要价远不止是进行贸易，而是要征服中国，陷中国为其殖民地。

伯驾也尽心竭力为美国政府效劳。鸦片战争交火的两年，正是伯驾返美度假时期。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性活动。1841年1月，他向美国国务院特别汇报了中国局势，郑重建议美国政府利用中英矛盾。他认为当前是美国插足其间从中攫利的好时机，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可能要超出对任何其他国家”。伯驾的这份书面材料，不但引起国务卿的高度重视，立即派他去英国、法国，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对华意图，还意外地使伯驾与国务卿的侄女产生了恋情，并且很快成婚。因此当伯驾赴英、法两国活动时，便具有半官半民的身份，在那里受到法王路易·菲力普、英国侵略军司令璞鼎查这样一些首脑级人物的接见，或同他们会谈。伯驾将他与法国国王谈话的内容写在给他妻子的通信中。法王在谈话中多次指出，英国在鸦片战争中远征路线长，军费开支大，所以他估